

全球智库半月谈

特朗普百日新政之外交纪要

全球价值链与通胀的全球属性

特朗普的经济治国之术：评千日新政

中国的全球经济意图

中美贸易缓和，欧洲如何应对

麦克马斯特将军需要对美国人讲什么

本期编译

郭子睿

黄杨荔

刘立群

史明睿

申劭婧

谢晨月

许平祥

伊林甸甸

杨茜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特朗普百日新政之外交纪要 7

导读：本文针对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特朗普对诸多外交事务的态度突然大变，其外交政策难以揣测。特朗普政府对反恐战争态度升级，同时无力为美国外交政策提出融贯的策略，这些可能为新政府带来大问题。

对特朗普税收计划的讨论 10

导读：过去二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有助于解决国内通货膨胀日益全球化的难题。它的扩张大大增加了中间及最终环节中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一国经济下行导致的价格压力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这可能使中央银行在管理国内通货膨胀时所做的权衡发生改变。

全球价值链与通胀的全球属性 12

导读：过去二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有助于解决国内通货膨胀日益全球化的难题。它的扩张大大增加了中间及最终环节中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一国经济下行导致的价格压力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这可能使中央银行在管理国内通货膨胀时所做的权衡发生改变。

特朗普上任百日及其拿破仑情结 15

导读：尽管其支持者和一些媒体大肆渲染，但事实上特朗普在其上任百日之内因为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阻拦，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在军事方面，他频频大动作，以往的总统望尘莫及。对于他的这些行动，外界褒贬不一。

特朗普的经济治国之术：评千日新政 17

导读：本文通过回顾特朗普政府新政 100 天里关于人选任命，政策的决策程序以及政策本身三个方面的做法，来推测未来 1000 天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经济政策。最后，作者认为一个国家如何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态度也非常重要，未来这些方面，特朗普政府都需要改进。

经济政策

美联储的新常态 19

导读：作者认为当前世界处于低利率环境的新常态，要判断美联储未来的加息路径，需要测算经济的均衡利率。作者研究发现，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主要解释自然利率的下降，模型测算的 2017 年的均衡利率是-1.6%，低于美联储的测算。如

果自然利率未来持续为负，作者提出如下建议，以避免陷入长期停滞：设置更高的通胀目标，持续的提高债务/GDP，更加慷慨的社会保障支出。

中美贸易缓和，欧洲如何应对 21

导读：自从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就包括中美贸易问题和北约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软化了他此前在竞选时期的立场。面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欧盟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行动，来确保欧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作者给出了分析和建议。

聚焦中国

中国的全球经济意图 25

导读：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讲话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全力维护，并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进程。习主席的这番讲话反映了中国怎样的经济意图？中国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其能够领导全球化进程？

中国的机遇，以及我们的 27

导读：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一些人不禁担忧中国会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表示会坚决维护经济全球化。作者认为，借着这次发言，美国可以测试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全球秩序的合伙领导人。中美关系正迎来历史转折点。

全球治理

全球和区域金融网——欧洲经验及其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启示 .. 29

导读：本文通过分析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大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歧，进而探讨欧元区分歧以及全球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全球政策议程——提高全球经济的普惠性和稳健性 38

导读：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正在加强，但取得更多进展还取决于能否推出政策来支持复苏、提高生产率增速和加强风险抵御能力。在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下，各国已从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多边合作框架中受益良多，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部分群体并没能分享到这些利益：危机后复苏进程过于缓慢，不仅使社会各阶层获得经济收益的空间受限，而且更是暴露出了上述问题。各国应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努力实现更平衡的强劲增长，同时为所有人提供经济机会。为此，各国应展望技术进步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影响，让本国民众具备必备的技能以从中获益，并出台国内政策来更广泛地分享这些成果。基金组织将通过提供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促进平稳调整的贷款安排以及开展能力建设等形式，为成员国提供支持。

战略观察

麦克马斯特将军需要对美国人讲什么 44

导读：继迈克尔·弗林中将辞职和鲍勃·哈沃德上将回绝特朗普的工作邀请后，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将接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2017年2月20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文章《麦克马斯特将军需要对美国人讲什么》，作者讲述了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海外的军事部署，指出“美国是一个战争的国家”。另外，介绍了美国特种行动部队与国家常驻部队的情况，最后期待麦克马斯特的接任会是美国国内外政治向前发展的一个好的开端。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日防卫关系 47

导读：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对美日同盟进行了一番抨击，但实际上，美日双边关系比特朗普说的要好的多。日本和美国各自都在扩展军事实力，以追求各自在亚太地区的目标。作者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一项急迫的任务就是制定合理的亚太政策。

本期智库介绍 49

特朗普百日新政之外交纪要

EMMA ASHFORD/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本文针对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特朗普对诸多外交事务的态度突然大变，其外交政策难以揣测。特朗普政府对反恐战争态度升级，同时无力为美国外交政策提出融贯的策略，这些可能为新政府带来大问题。编译如下：

对于外交政策研究者而言，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有点像过山车。短短三个多月中，新一届政府从一场危机陷入另一场危机，从叙利亚到朝鲜，从中国到加拿大，特朗普在诸多外交政策上的突然大逆转足以引起众多议论。同时，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政策和声明让人难以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而，抛开种种困惑，百日新政中有一些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走向：

1、并不存在所谓的“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对北约等问题的态度逆转被一些人称赞为更接近“正常”的总统。虽然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时，对其广泛的外交政策终将走向何方、试图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面临的障碍并不清晰，然而，即便按照这些标准，特朗普的外交态度仍不明朗。最近，白宫幕僚长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对“特朗普主义”的表述更增加了这种混淆：

特朗普正在“重塑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立场”，并且“对我们不允许特定的人进入的领域划界（比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建立真正的‘特朗普主义’”，“我们对中东地区长期的地面战争不感兴趣，而是关注伊斯兰国，在中东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护美国”，“与中国就朝鲜问题正在进行的合作也是非常真实而严肃的问题，需要区域协作以妥善处理”。

另一名官员补充道，“特朗普作为‘惊人的谈判者’的地位也是该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些言论表明，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应对危机方面具有高度能动性，但并未显示出总体战略。

2、特朗普在逐步升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这种升级最明显的标志是在阿富汗使用 MOAB（巨型空爆炸弹），这种炸弹常被亲切地称为“炸弹之母”。除此之外，新一届政府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选择了升级冲突。有更多军队被送往大中东地区，加入到对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IS）中去，此外特种作战部队也参与了反对也门基地组织的地面行动。

特朗普政府还放松了在也门、阿富汗、索马里和其他地方的交战规则，并增加了轰炸袭击和无人机袭击的次数。根据监察组织的说法，特朗普给予将军们在这些冲突中自由行动的空间，这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大幅增加。

3、边缘政策可能复兴

新总统似乎在增加全球紧张局势方面天赋异禀。尽管特朗普政府保证在伊朗问题上遵守奥巴马时期的核协议，但也宣布了一项为期 90 天的交易审查，多位官员对伊朗的措辞也越来越强硬。特朗普政府还表示要加大对也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支持力度，以打击胡塞叛军，后者常被称为伊朗代理人。

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副总统迈克·钱斯（Mike Pence）警告朝鲜，若其继续进行导弹或核试验，“所有选择都将摆上谈判桌”。在美韩联合演习、朝鲜实弹演习之下，半岛局势愈发紧张。新政府的声明究竟准确反映了他们的立场，还是仅仅措辞激烈？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声明很容易引发潜在冲突。

4、顾问真的很重要

《政治学研究》表明，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顾问也不能取代缺乏经验的总统。不幸的是，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毫无经验。虽然他任命的一些人确实有经验，比如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但其他人仍然缺乏经验，比如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或是持有令人不安的世界观，比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

百日新政中，美国政府内部顾问之间的内斗也一直引人注目，特朗普的政策非常具有任意性，顾问之间意见的不合可能是重要原因。但是，顾问真的很重要。只是还不清楚哪一派的顾问团队会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胜出。

5、能力是关键

特朗普的一些外交政策决策似乎更趋近传统的鹰派共和党作风，而他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叙利亚北部的紧张局势、阿富汗的棘手冲突，远比这届政府存在的时间久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府对各种危机的反应远谈不上称职，部分原因是缺乏经验，以及对国务院、国防部的关键岗位尚未任命官员；还有部分原因来自特朗普政府本身，移民禁令和退出 TPP 都是例证。

奇怪的外交政策事件不仅于此，比如特朗普的首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弗林（Mike Flynn）在 25 天内被迫辞职，原因是在游说土耳其和俄罗斯时误导了政府；在总统办公室会议上，特朗普拒绝与德国总统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握手，后来声称没有听到这一要求；特朗普曾致电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祝贺他在巩固其独裁权力的可疑的公投中获胜；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搞错了一艘航空母舰的位置，宣称

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正前往朝鲜半岛展示武力，事实上却在澳大利亚附近，朝着另一个方向行驶。

这些事件不仅作为个体值得关注。再结合特朗普容易咆哮、尚武倾向等个人背景更佳值得深思。总之，特朗普政府对反恐战争的升级、以及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无力会带来更大问题。如果特朗普的百日新政真的代表了他的外交政策的水准，可预见未来四年将是一段崎岖之路。

本文原题为“Takeaways from Trump’s first 100 days”。本文作者为 EMMA ASHFORD, Cato 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对特朗普税收计划的讨论

James Pethokoukis /文 杨茜/编译

导读：过去二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有助于解决国内通货膨胀日益全球化的难题。它的扩张大大增加了中间及最终环节中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一国经济下行导致的价格压力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这可能使中央银行在管理国内通货膨胀时所做的权衡发生改变。编译如下：

即使使用了大口径的动态评分原则，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依然不太可能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至少依据那天发布的那一页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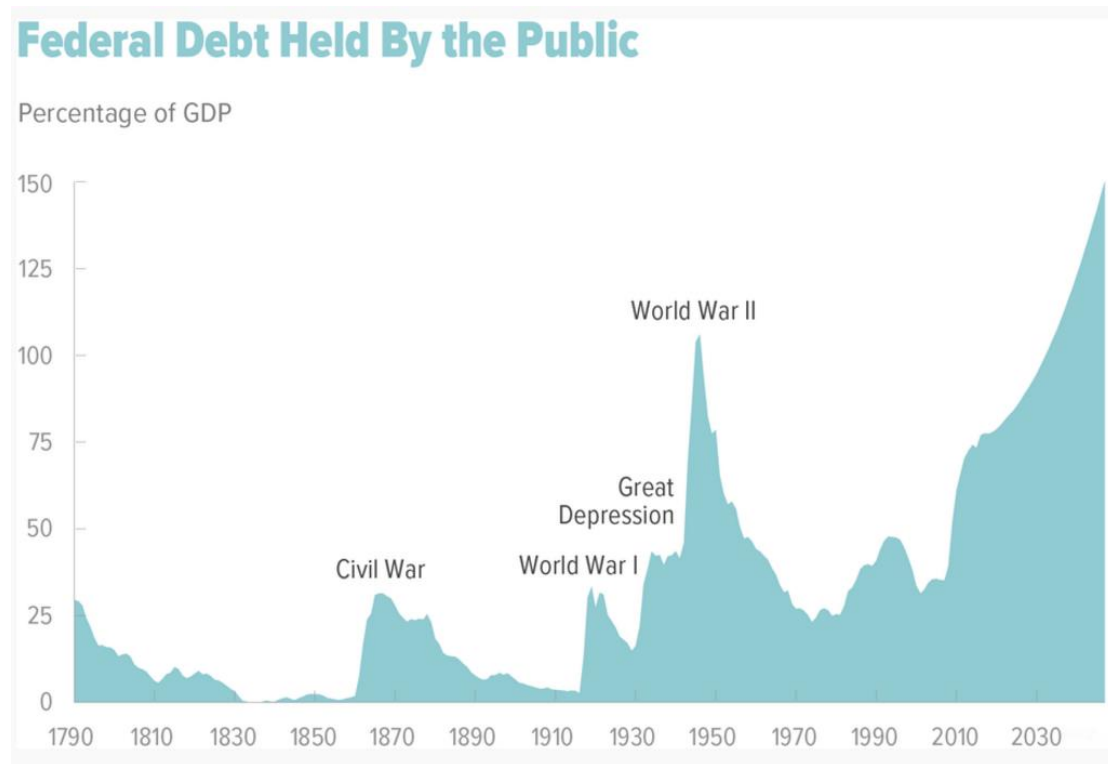
虽然可以说，35%顶级公司税率将美国放在了 Laffer 曲线的错误一边，但削减了一半以上的税率，并通过更高的经济增长收回所有损失的收入，这个跨度似乎太长了。我的意思是，5万亿美元意味着大量的赤字。我们也不应该期望能通过减税来完全弥补这个缺口。1981年的里根减税就没有弥补当时的财政损失。并且根据两位小布什的经济学家 2004 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从长远来看，“约 17% 由于劳动力税降低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通过之后的经济增长收回。在削减的资本税方面，这个数字为 50%。”

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彭博视角”的文章中承认，特朗普计划将增加赤字，但补充说“财政原因不能阻止这样的税收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通过分析民主党人一直以来使用的减税政策来衡量现在的减税政策，就不存在财政原因了。考虑到需求和目前的低利率，许多左派经济学家，包括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一直在争取更多的赤字型公共投资。所以，考恩在倡导增加赤字帮助公司减税的时候翻转了这么做的原因：

他关于公司减税的论据非常像凯恩斯主义者多年来一直用于提倡政府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论据，即“让我们在借款利率低的时候多借点钱”。这两种观点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这些支出将由私营公司完成，而非联邦政府。不管你是否认为私人支出比政府开支更具社会价值，但如果你认为我们能负担得起一种刺激措施，我们就可以承担起另外一种刺激，就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即使你认为政府支出会产生更高的回报，私人投资回报率可能高于政府的借款利率。直言不讳地说，我担心的是，我们可以负担大量的政府刺激，但我们买不起相应的私人刺激。

换句话说，双方现在都有自己的“赤字无关紧要”的版本，一个更加信任政府，另一个更加信任市场。也许考恩和萨默斯都是对的，也许值得冒着赤字增加的风险进行减税和公共投资，以使美国摆脱经济增长缓慢的处境。也许 CBO 反对债务扩张案是错误的。

同时，也许特朗普团队应该更努力一些，补齐因减税减少的财政收入。也许税改政策应保留原有对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或者保留遗产税。也许应该努力减少财政支出。减税力度不应该这么大。我的同事艾伦·维亚德（Alan Viard）曾概述了一些支付公司税收改革的方法。我认为，美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支出方式大大增加。引用斯塔克家族的经典名句：“Winter is coming”。



本文原题为“Of course the Trump tax plan wouldn’t pay for itself. Should we care?”。本文作者 James Pethokoukis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栏作家和博主，他曾担任路透社专栏作家。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价值链与通胀的全球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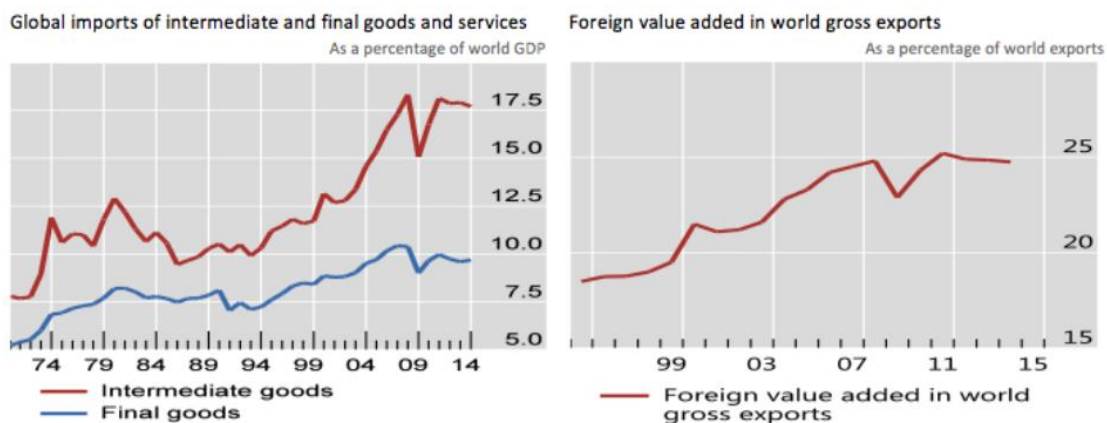
Raphael Auer, Claudio Borio, Andrew Filardo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过去二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有助于解决国内通货膨胀日益全球化的难题。它的扩张大大增加了中间及最终环节中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一国经济下行导致的价格压力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这可能使中央银行在管理国内通货膨胀时所做的权衡发生改变。编译如下：

过去二十年，国际贸易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来说，随着市场准入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不同的生产阶段在全球各地越来越分散（Baldwin 2016）。这些生产安排通常被称为全球价值链（GVC）。

随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协调全球范围内公司在各个阶段的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中间贸易迅速发展。从 1995 年到 2007 年，中间贸易相对于最终商品、服务贸易的比例从 1.25 增加到 1.75（图 1 左侧）。Johnson 和 Noguera（2012）纠正了运用输入的跨境贸易量时对贸易总流量的重复计算，他们发现，中间贸易比例增大的趋势在加工增值贸易（图 1 右侧）中依然可见。

Figure 1. GVCs have grown substantially since the early 1970s



根据以往经验，人们期望 GVCs 的增长能影响通货膨胀的变化。GVCs 的扩展可以增加工资和价格压力跨越国界的渠道。直接的渠道是通过进口投入品的价格变化释放通胀（Auer 等人 2017 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这种释放通货膨胀的渠道在国际通货膨胀协调中占据大部分）；另一个间接的降低通胀的渠道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建立更多的链条（即通过更大的市场竞争力）来加强竞争。因此，这种调整方式也可能使国内通货膨胀对扭转全球经济下行的政策措施更加敏感。在结构上，更高的相互联系使企业能够通过从国外采购更容易地绕过企业所在地的瓶颈。周期性地，全球经济下行受到遏制可能会给当地生产商提供更多的空间来提高价格，而不用担心失去对国外进口商的销售市场份额。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Auer 等人，2017）。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更多参与全球价值链解释了本国和全球经济下行在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方面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现象一直以来在多国都有体现。我们选取 17 个国家在 1982-2006 年期间的数据，其中衡量国内和全球经济下行对国内通货膨胀变化的相对重要性来自 Bianchi 和 Civelli（2015），并且根据 Borio 和 Filardo（2007）的思想分析计算得出的。全球经济下行被认为是海外贸易加权的总和减少。各国的贸易权重不尽相同，所以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程度因国家而异。

图 2 描绘了各国之间的关系。横轴用于衡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商品和服务的中间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两条纵轴分别显示了通货膨胀对国内和全球产出下滑敏感程度的估计值。对于单个国家而言，这些都是随时间推移的。我们可以看到，平均而言，在这一时期，参与全球价值链越多的国家，其国内通货膨胀相对于本国产出下降（左图）的敏感程度较低，对全球贸易伙伴产出下降（右图）的敏感度较高。这些联系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中都是显著的。例如，估计值表明，在一个中间贸易与国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其他同类经济体 0.1 的经济体中，国际产出每下降 5%，其通货膨胀率就会升高约 0.33%。

Figure 2. GVCs make inflation less domestic and more global across count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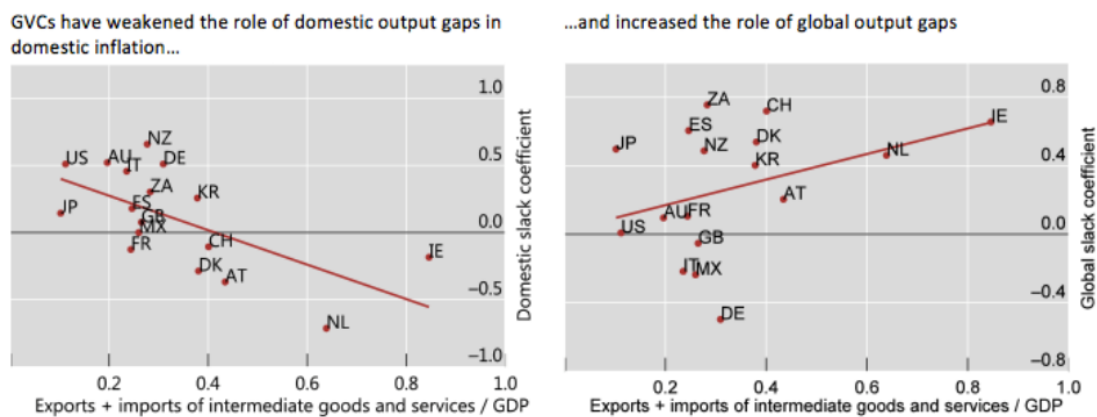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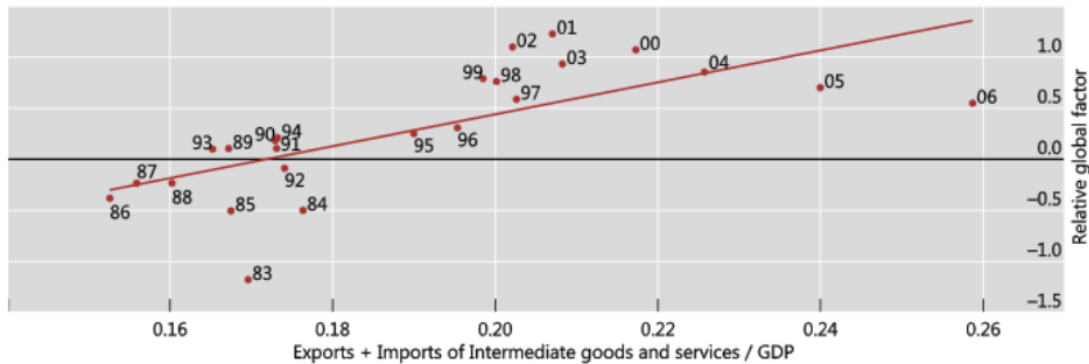


图 3 描绘不同时期的关系变化。在这里，横坐标表示了在一年中各国参与 GVCs 的程度，而纵轴则显示了全球和国内产出下降对通货膨胀的相对影响的平均值。回归线是统计学显著的。换句话说，平均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全球因素的不断扩展一起，对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日益明显。

Figure 3. GVCs make inflation less domestic and more global over time

在对于 GVCs 参与和通货膨胀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总体波动和国家特征的影响，并进行了一些全面的检验。具体来说，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表明，这种关系的证明考虑到了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排除异常值、选择各种子样本以及使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替代性指标，因此可以说这种密切关系的存在是基于全面考虑的。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考虑到以往研究中使用的常规贸易和金融开放措施。我们发现，一旦全球价值链被加入考虑范围，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际资产和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解释通货膨胀的全球化方面只有很微小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对全球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而言。在理论方面，他们提出了将通货膨胀模式视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现象的方法。在实证方面，他们认为，应该发展出更多用于描述全球经济下行的指标，这些指标应该能反映贸易中处于不同附加值环节的各国的情况，而不仅仅是用贸易总额来衡量贸易。

在制定针对国内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时，全球因素具有深远的影响。毕竟，这些因素超出了任何单个中央银行的控制范围，并且引发了很多关于抑制通胀策略标和政策有效性的问题。任何这些影响都非常重要，不能被忽视。

本文原题为“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increasingly global nature of inflation”。本文作者 Raphael Auer 是 BIS 货币经济部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上任百日及其拿破仑情结

Gene Healy / 文 申劭婧 / 编译

导读：尽管其支持者和一些媒体大肆渲染，但事实上特朗普在其上任百日之内因为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阻拦，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在军事方面，他频频大动作，以往的总统望尘莫及。对于他的这些行动，外界褒贬不一。编译如下：

“上任百日”一开始曾经是一个独裁的比喻。1933年，记者们将罗斯福在立法上的突进比喻成拿破仑1815年逃出厄尔巴岛，在为期三个月的反攻后折戟滑铁卢。从此，“百日”成为了形容总统的一个词汇。

幸运的是，特朗普总统刚上任的100天并没有如此的戏剧化。就好像是拿破仑并没有向巴黎进军，发动战争，而是一边惬意地坐在托斯卡纳的别墅中，一边大声骂着他的敌人。

从去年秋天葛底斯堡公布的“新政百日计划”来看，特朗普强力推进的一些计划遭到了国会和法院的阻拦，这使得他在众人反对声音较大的领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个曾经宣称“我自己就能搞定一切”的人也慢慢意识到，起码在国内的环境，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个人统治是保持抵抗态度的。

特朗普最近强调，“在最初的90天内并没有完成什么行政计划”。这与早先他的支持者们喊出的类似“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就职典礼”“里根以来最大的选举团胜利”等口号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几天后他表示就职百日是一个“可笑的标准”时，他离这个标签又近了一步。

然而，根据一些媒体周二报道的白宫的消息，特朗普拥有“历史性成就的一百天”，该报道错误的认为总统成功与否应该通过纯粹的体量来评定。报道宣称，“特朗普总统在他任期的前100天内完成了超过罗斯福以来任何总统的成就”因为他“签署了30个行政令”及“大量立法令”！

但是，很显然特朗普100天内的记录无法与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的恐慌气氛下通过的15项主要新政相比。此外，他也没能像奥巴马一样，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就职一个月内就颁布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但是那又如何呢？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总统都不能在非全国性紧急情况时快速的推进立法。所以我们应该对特朗普未享受到众人争相利用的所谓“好危机”而心存失望吗？

没有总统希望自己看上去软弱无力，特朗普尤其如此。但是在媒体持续刺激下的公众对就业率的高期望和总统实际可以达到成就的巨大鸿沟面前，保持自己的强势确实非常艰难。

在最初的三个月内，特朗普已经认识到总统是个十分令人沮丧的工作。政府不可能像企业一样运营，他不可能像勒令员工辞职一样简单的解散国会或者最高法院。“如果我能同时担任总统，执掌国会就好了！哪怕 10 分钟！”罗斯福的堂兄泰迪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不过至少有一个领域总统可以大展身手，那就是军事领域。在这里，总统拥有特朗普一直渴望的强权，这也是他最近才明白的道理。

目前为止，特朗普已经在叙利亚投入了额外兵力，放松了为控制平民伤亡而制定的交战规定，并在也门投下了比奥巴马任期内任何一年都多的炸弹。当他 4 月 6 日宣布向叙利亚空军基地增加 59 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时，他发现自己看上去更像总统了。正如扎克利亚在叙利亚袭击的后一天激动地说道“唐纳德特朗普（昨晚）成为了美国总统”。

在支持特朗普非法对叙空袭问题上，扎卡利亚并非一人。媒体称赞对叙袭击为特朗普赢得了好名声。但是梅迪逊反对将发动单边战争的权利全部给予总统一人也有一定道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种信任和诱惑都难以抵抗”。

在其任期首个百日内，特朗普发现自己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够浏览全球地名，并有将其炸成碎片权利的人”。此外，在他做出成就之后，他也可能成为美国的“意见领袖”。但这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来讲却未必是利好消息。

本文原题为“The Napoleon complex and Trump’s first 100 days”。本文作者 Gene Healy 是 Cato 研究所的副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的经济治国之术：评千日新政

Matthew P. Goodman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通过回顾特朗普政府新政 100 天里关于人选任命，政策的决策程序以及政策本身三个方面的做法，来推测未来 1000 天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经济政策。最后，作者认为一个国家如何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态度也非常重要，未来这些方面，特朗普政府都需要改进。编译如下：

回顾特朗普的新政 100 天会让我们收获很多，但我们更关心特朗普未来 2-4 年的经济政策。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党的成功需要：人选，程序和政策。通过回顾特朗普新政 100 天关于这三点的做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其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

关于人选显然不够：整个政府只有 24 个是特朗普任命的；没有美国贸易代表；在国会，财政部，商务部和其它机构都没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非正式顾问团。但这些职位终究会被填补。

在本月早些时候有一篇深刻而又有趣的文章，塔夫茨大学的 Dan Drezner 认为，尽管特朗普缺乏从政经历，但他任命的雷克斯-蒂勒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James Mattis 将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会越来越越好。事实上，在新政的 100 天里，他们表现的外交技巧还是让人欣慰的。但是，Drezner 最后指出，他还是担心特朗普的任命的这些在其它领域有着天赋的人，能否真正做好政策决策工作。因此，特朗普在国际经济领域能否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开始任命那些在该领域有资深经历的人。比如，提名的美国财政部官员 David Malpass 和 Adam Lerrick。

至于政策决定的程序，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之间的分工。加里·科恩似乎已经掌控国家经济委员会并正在调解总统关于贸易最本能的想。但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该充分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经济战略，但这否发生并不清楚。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需要较强的理解经济的能力，这或许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家经济委员会进行充分的协调。第二是，在建设业务责任线机构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该协调发挥功能。奥巴马政府就曾因为将更多的业务责任赋予越来越臃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而饱受批判。在特朗普政府上，这方面出现了改善迹象，至少在国家安全方面，白宫给予国防部足够的执行政策的空间。但是司法还没有参与国际经济政策，这些关键的参与者和程序还是不够完善。第三个程序问题就是国务院在国际经济决策中是否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工具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战略工具，而不仅仅是战术工具。马歇尔计划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经济战略两个最好的例子，用来塑造同盟和对手的行为，而不仅仅是支持美国的政策。

接下来就是政策本身。一个成功的国际经济政策需要智能防御和智能进攻。强劲的执行现有的贸易协定核心在于前者，特朗普政府咆哮非法或不公平的贸易是正确的。特朗普也明白不会按照他竞选时宣称的，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违反 WTO 的规定对中国单边征收关税。

如上所述，特朗普迷恋贸易赤字是误入歧途。彼得森研究所也声称美国贸易执法情况所带来的风险。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了钢铁和铝进口之后，声明本月将会特别麻烦。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行动会导致其它国家认为以国家安全名义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智能防御。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回避有关智能防御的关键战略工具：退出 TPP，削减为世界银行和 IMF 等国际机构的融资，关闭私人海外投资公司。

一旦 Robert Lighthizer 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预计 5 月初），特朗普的贸易平衡政策是否会从防御转向进攻？Lighthizer 是里根政府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副主任，曾经与日本进行出口限制谈判，大量的法律生涯都用来研究倾销和反倾销税的案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张开放市场和协商签订新的协议，而不是防守。

当然，如何展示一国的态度也非常重要。让对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失去平衡可能很有用，但总统不能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咆哮，他们不应该侮辱其它国家，他们应该支持重要的国际承诺，比如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在 G20 和 IMF 公报两件事上都已经失败。在未来的 1000 天内，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都需要改进。

本文原题为“Trump’s economic statecraft: The first 1,000 days”。本文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是 CSIS 政治经济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
[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的新常态

Gauti Eggertsson, Neil Mehrotra, Jacob A. Robbins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作者认为当前世界处于低利率环境的新常态，要判断美联储未来的加息路径，需要测算经济的均衡利率。作者研究发现，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主要解释自然利率的下降，模型测算的 2017 年的均衡利率是-1.6%，低于美联储的测算。如果自然利率未来持续为负，作者提出如下建议，以避免陷入长期停滞：设置更高的通胀目标，持续的提高债务/GDP，更加慷慨的社会保障支出。编译如下：

特朗普的当选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11 月 8 号特朗普当选，股票价格下跌，债券价格上涨。但是，接下来的几天，特朗普承诺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和企业减税，激起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债券价格迅速下跌，10 期国债上升 20 个基点，到 2.06%。截止到三月底，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 2.39%。

随着通胀接近目标以及失业率的新低，自从大选之后，美联储已经加息 2 次，短期利率为 0.75。现在，全球都非常关注美联储未来的加息路径。未来利率的上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对自然利率的看法。

自然利率是一个理论值，并不能直接通过数据测量，要通过模型进行测算。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美国的自然利率是 2%。但从 2015 年 10 月，大家开始重新思考这一数值。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美国的自然利率从 2014 年 6 月的 1.75% 下降到 2015 年 12 月的 1.5%，到 2016 年 12 月进一步下降到 1%。其主要驱动因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以及人口的老龄化。

今天美联储的实际利率大约-1%，美联储是否进一步采取宽松的政策，这取决于如何看待数据。美国的就业一直在强劲增长，这支持美联储加息，但美国的通胀一直很低，核心通胀率还没有超过 2%，这又不支持美联储加息。

通过比较历史数据我们可知：第一，即便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当前的利率也是处在历史的较低水平；第二，低利率并不是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利率的下行已经持续了 25 年；第三，主要工业国家的利率都在下行，当前欧洲和日本还处在零利率。

为什么利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下降？数据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美国出现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如劳动生产率在 1970 年初开始下降；投资品的价格开始下降；二战之后的婴儿潮在 1970 年成为劳动力，在 2010 年开始退休。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因素对实际均衡利率的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大型的多期的生命周期模型，引入人口结构，劳动生产率，企业投资需求，市场垄断竞争结构等因素。结果发现：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主要解释自然利率的下降，政府债券的增加会导致利率的上行。如果把这些主导因素设置到 2017，我

们模型的均衡利率是-1.6%，低于美联储的测算。换句话说，我们的模型表明当前利率已经接近自然利率水平。如果自然利率果真为负，在 2%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任何一个小的冲击很可能使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而且这些主导因素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想让均衡利率回到正的 1%水平，也即是美联储预测的，那么需要将出生率上升到每个女人 3.28 个婴儿，劳动生产率上升到 2.4%。当然，最有意思的是政府债务/GDP 的比例上升到 215%，这刚好符合特朗普的政策。前提是，我们不考虑政府债务上限。

我们的分析并不是说未来长期一定是零利率，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短期利率可以暂时为正。但是当今的世界就是一个新常态，需要负利率才能维持充分就业。如果利率持续为负，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建议，以避免陷入长期停滞：设置更高的通胀目标，持续的提高债务/GDP，更加慷慨的社会保障支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不确信我们就是在新常态还是不远的将来低利率环境就会结束。

本文原题为“To accommodate or not: The Federal Reserve’s new normal”。本文作者 Gauti Eggertsson 是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Neil Mehrotra 是布朗大学的助理教授，Jacob A. Robbins 是布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贸易缓和，欧洲如何应对

ANDRÉ SAPIR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自从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就包括中美贸易问题和北约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软化了他此前在竞选时期的立场。面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欧盟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行动，来确保欧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作者给出了分析和建议。全文如下：

在上任近百日后，特朗普总统大幅调整了此前对中国和北约的外交主张。毫无疑问，这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意味深长。

在当选总统之前，特朗普曾承诺要与中国“硬碰硬”。在他对美国选民许下的诺言中，他宣称要命令财政部长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但在上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特朗普改变了立场，他表示：“中国并不是汇率操纵国”，而这也正是财政部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外汇政策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

假如美国财政部坚持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话，那意味着财政部将牵头与中国有关部门展开谈判，劝说其改变汇率政策。如果中国拒绝，那么美国将不得不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毋庸置疑，这将导致一场蔓延全球的贸易战，并最终波及到欧盟国家。

由于此事与欧盟密切相关，因此欧盟一直对事态进展高度关注。中国、美国 and 欧盟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并且远超全球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见图1）。截止2016年，中、美、欧共占到全球：

- 60%的GDP（以美元计算）；
- 50%的GDP（以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
- 45%的国际贸易总量（除去欧盟国家内部的多边贸易）；

而中美欧三者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具体来说：

- 欧盟是美国和中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 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 美国是欧盟和中国的头号出口目的国；
- 美国是欧盟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 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国，也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目的国；

- 中国对欧盟和美国而言都是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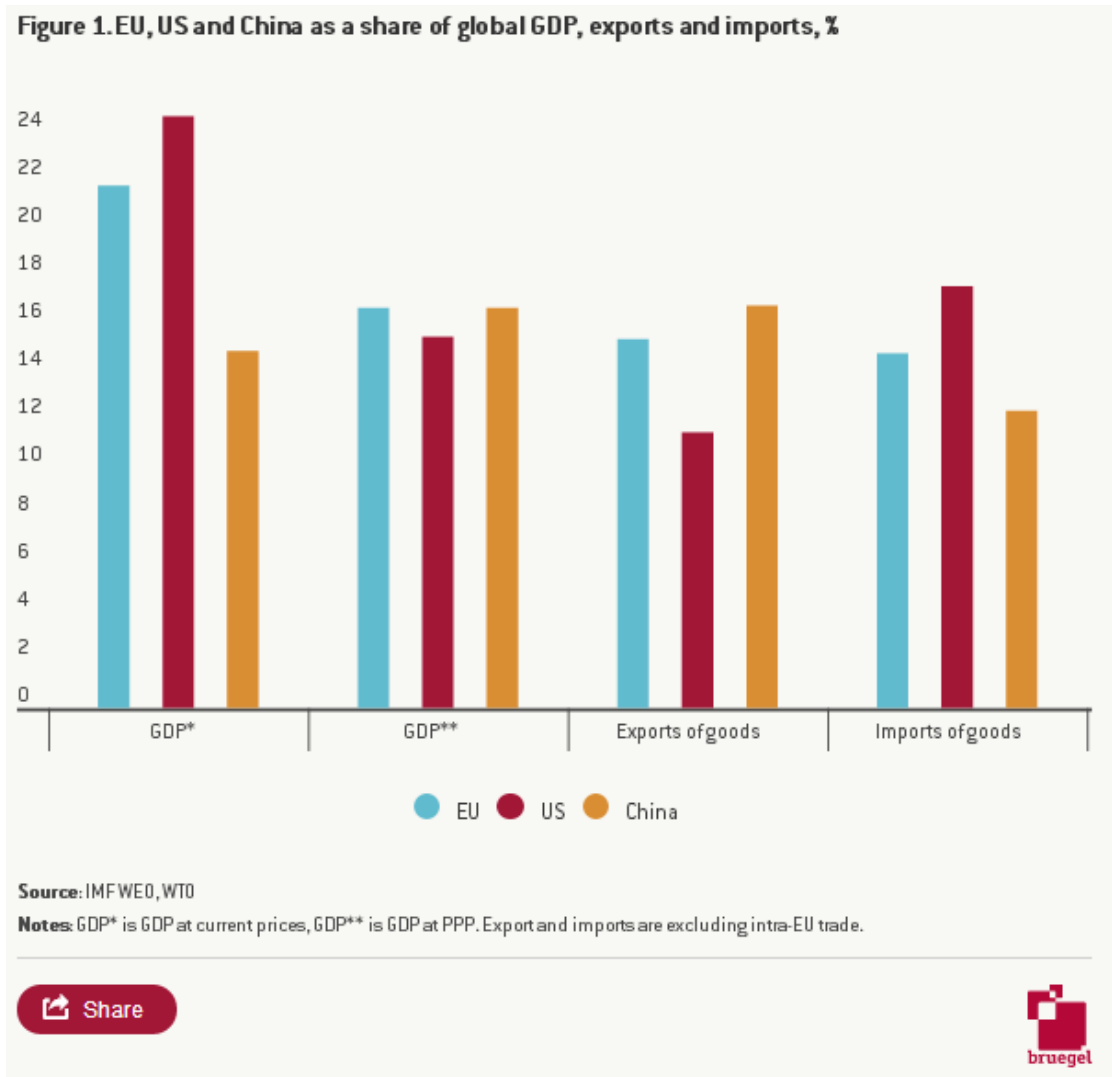


图 1 欧盟、美国和中国占全球 GDP、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例（%）

尽管无数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讲，两国间贸易平衡与否并不值得关注。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客还是反复宣称美国对华巨额的贸易赤字是因为中国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并且这种赤字大大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程度，是衡量两国间贸易关系紧张程度的重要指标。

截止 2015 年，中、美、欧各自之间的双边贸易都呈现出相当不平衡的态势，具体来说：

- 中国保持对欧盟 30% 的贸易盈余，同时保持对美 60% 的贸易盈余；

- 欧盟保持对美 20% 的贸易盈余；
- 美国对华存在 60% 的贸易赤字，而对欧则有 20% 的贸易赤字；

中美间巨额的贸易赤字，无疑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频繁抛出反华论调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因为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一些因素，已经在贸易问题上暂时软化了对华立场，但特朗普政府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还是在最近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发起了新一轮对美中贸易巨额赤字问题的攻击。

综上所述，由于美中欧三者之间复杂的贸易关系，美国与中国潜在的贸易摩擦对于欧盟来说意味着严重的威胁。如果美中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欧盟应该选择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理由有三点：

首先，欧盟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要比与中国的联系紧密得多。欧盟对美的商品出口规模是对华出口的两倍，而对美的服务出口是对华的七倍。对于欧盟来说，美国也是最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在 2015 年，美国占到了全世界对欧投资总额的 40%，但相比较而言，中国仅仅占到全球对欧投资的 1%。

其次，欧盟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为类似，只是欧盟国家相对来说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而已。相反地，中国则是一个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中占重要地位，政治上一党执政的国家。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和分歧，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导致双边贸易分歧的深层原因。而考虑到欧盟和美国对中国都有巨额的贸易赤字，欧盟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最后，欧盟周边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对欧盟而言意味着严重的潜在威胁，而仅靠欧盟国家自身，目前还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危机，因此欧盟也非常需要美国的领导，在北约组织的框架下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毫无疑问，最近特朗普对北约态度的转变令欧洲国家领导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说：“我曾说过（北约组织）已经过时了，我现在改变我的说法，它并不过时。”不过，欧盟的领导人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是完全可能发生改变的。

尽管如此，欧盟还是至少有两条理由要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

第一，欧洲的领导人们已经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维护并推进自由和公平的国际贸易的多边贸易体系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欧洲领导人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密集发声，无疑是受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式论调的影响。考虑到美国可能动摇对 WTO 框架内的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支持，欧盟可以考虑向中国寻求支持，以捍卫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

第二，正如我们最近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和欧盟都希望阻止美国走上保护主义的邪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和中国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我们不能忘记，欧盟对美国同样保持着贸易盈余。因此，欧盟也同样可能在未来成为美国贸易战攻击的对象，这对于本已疲软的欧洲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坏事。

那么，当下欧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从而避免在中美可能的贸易战中招受损失呢？我们认为，欧盟可以考虑采纳以下五条政策建议：

1. 欧盟应该不断向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自 1947 年关贸总协定（GATT）成立以来，一直对推进和维护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做出着重要贡献，而维护自由和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对美国和欧盟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2. 欧盟也应该提醒中国，它们自从加入 WTO 后，成为了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如今应该担负起肩上的责任，为维护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贡献力量。同时，欧盟也应该努力在 2020 年之前与中国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定。

3. 欧盟应该团结美国、中国，以及其他 G20 国家，在现存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推进国际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现代化，并推动对 WTO 本身的改革。

4. 欧盟委员会应该严肃地考虑效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机制，在欧盟委员会框架下建立欧洲版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议事关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事宜。毫无疑问，这种委员会可以在中欧的双边贸易谈判事务中，赋予欧盟更多的选择和谈判空间。

5. 最后，欧盟应该在欧洲国家内部凝聚共识，在与北约组织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维护欧洲的安全，从而进一步对美国施压，确保其不放弃对北约的安全承诺。

本文原题为“Trump’s U-turn on trade with China is good news, but the EU should not be complacent”。本文作者 ANDRÉ SAPIR 是欧洲智库 Bruegel 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全球经济意图

Marek Dabrowski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讲话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全力维护，并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进程。习主席的这番讲话反映了中国怎样的经济意图？中国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其能够领导全球化进程？全文如下：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在我看来，他的这番表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思想。在这三十年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一举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并且消灭了曾经困扰许多中国人的极度贫困。根据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中国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上世纪 80 年代，其人均 GDP 仅仅相当于美国的 2.5%，到了 2015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25.6% 水平。而如果我们以购买力平价方式计算总 GDP，那么中国已经在 2014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与过去相比，中国现在对持续良性运转的全球贸易体系更加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而中国的企业也在不断设法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为此，中国企业一贯对于进口国外技术抱有浓厚兴趣。就投资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近年来中国也逐年扩大了其对外投资的规模。中国的对外投资此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相关产业，但最近中国扩展了其对外投资的领域。对于中国的巨头企业来说，为了给进一步的投资扩张铺路，它们需要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既是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冲击，也是由于中国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同样地，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也需要继续深化其与全球和地区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体化，加强与其他国家间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的交流。此外，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它还需要继续从世界领先的科技大国那里引进更多现代化技术、掌握高技术的领军人才，以及与研发水平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加强合作。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而言，进一步推动经济和贸易领域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秩序，是中国当下的核心利益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更需要起到表率作用，维护和推进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不过，如果真的想成为全球化的领军国家，中国也需要在国内推

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包括：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完善机构和制度设计、准许人民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拥有更多自由，以及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

同时，中国也需要改革和开放其国内的金融市场、减少对资本账户交易的限制、取消对外资的服务业壁垒、并且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中国也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将政策目标改为盯住通胀。为了避免外界对中国操控货币的频繁指控，中国也可以放开人民币的汇率管制。最后，中国也应该更多地承担国际义务，为全球和地区安全贡献力量，并且打击困扰其边境地区以及邻国的恐怖主义组织。

本文原题为“[What are China’s global economic intentions?](#)”。本文作者 Marek Dabrowski 是欧洲智库 Bruegel 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同时他也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HSE）的经济学教授，华沙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CASE）的联合创始人及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机遇，以及我们的

Michael J. Mazarr/文 章珏/编译

导读：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一些人不禁担忧中国会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表示会坚决维护经济全球化。作者认为，借着这次发言，美国可以测试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全球秩序的合伙领导人。中美关系正迎来历史转折点。文章编译如下：

维持了三十多年稳定发展态势的中美关系，在最近，却突然陷入了混乱。美国先是宣称将重新考虑“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又似乎放弃了该意图。美国政府一方面诉求构建建设性伙伴关系，一方面又在贸易和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对抗。人们尚不清楚为何会这样。但如果美国政府仍想要通过合作以影响中国行为的话，那么中美之间应该采取更好的接触方式，而不是上升的对抗。

在最近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主席习近平重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捍卫全球化和自由世界经济秩序，通过全球经济治理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承诺。大部分人对此都持怀疑态度。但是这次发言对美国而言却是一个检测中国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的重要机会。

过度解读习的发言是错误的。习很可能只是将这次发言视为一个推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改善中国在亚洲摇摇欲坠的国际形象的时机。他的发言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野心有了变化。

但若是忽视了这将是—次历史性机遇，也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看待当前世界秩序的态度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政治的经典理论，即认为崛起国必将挑战霸权国，这种权力转移往往会导致冲突。另一方面，中国将自己视为亚洲天然的领导者，且在历史上曾受到西方的持续剥削和打压。因此，中国会接受并融入现存世界秩序的希望很渺茫。中国在南海的野心、对网络干预的暗中支持，对外贸的管控等行为使得一些人更加坚信这种结论，即中国不会拥护，只会推翻现存秩序。

但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太过草率。在最近的三十几年里，中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度在明显上升。它在各大国际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维和等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很容易就忽视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它还是被孤立和怀疑的。从更广的历史维度讲，中美两国战略的对接使两者都从中获得了好处，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发展本国经济，美国使中国融入自己主导的秩序中。就像习近平在达沃斯所说的，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是大势所趋，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它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不满感也更加清晰。许多观察家都预测中国很可能会偏离现在的轨道。“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论调在华府甚嚣尘上。

作者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将迎来历史转折点。

这次的发言呼吁在现存的国际规则下，实现共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对此，作者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可以这样说，“我们认可你的承诺。并欢迎中国积极推进现存秩序和价值。”这种回应表达了美国逐渐接受中国作为领导世界秩序的合伙人，并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推进关键标准的意思。

互不侵略、法治和公平贸易是三个基本原则。对每一项原则，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以尝试让中国官员去努力践行，比如诉诸国际法解决主权争端，改变排外的贸易政策。此外，美国必须在国际社会大力宣扬希望看到中国像习所指明的那样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

凭此，我们可以测试中国贯彻习发言中的政策主题的积极性，以及引导中国成为更正式的全球秩序合伙领导者的可能性。这将标志现存美国对中政策的转变，现存的对中政策旨在将中国汇聚到美国主导的系统中。

我们必须清楚，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中国没有心情接受管控，它的政策以及在主权和贸易领域的野心也可能是无法改变的。在大多数领域，至少现在看来，它还不情愿发挥领导作用。

哪怕存在风险，这种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去尝试。中国可以维护全球稳定，也可以推翻世界秩序。现在可能就是美国还可以影响其政策选择的最好时机。

本文原题为“China's opportunity-and ours”。本文作者为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 Michael J. Mazarr，他主持了“建设可持续的国际秩序”项目。本文刊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和区域金融网

——欧洲经验及其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启示

Bennet Berger, Guntram Wolff/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本文通过分析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大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歧，进而探讨欧元区分歧以及全球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编译如下：

1、引言

欧元区分歧和全球劳动力份额下降已成为共识。我们通过分析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大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发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欧元区国家的竞争力分歧主要体现在单位劳动成本（ULC）和经常账户上。图 1 显示了三大经济体的 ULC 在危机前大幅分散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经济体的 ULC 与相关的失业人数的差异仍然很大。

图 1：基于 ULC 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欧元区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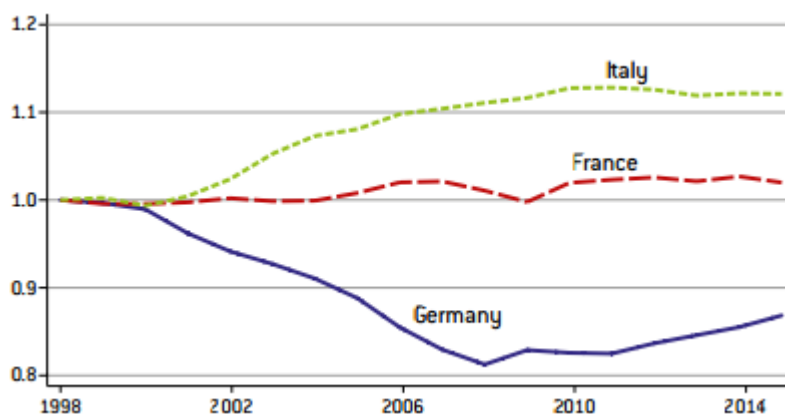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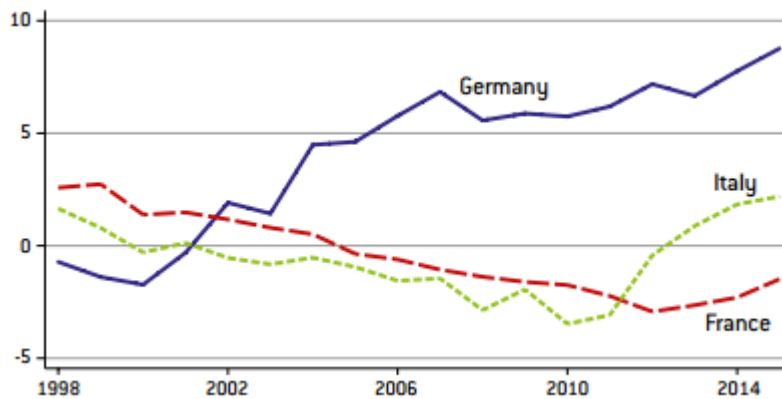


图 2 显示了三大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百分比的情况。法国和意大利的经常账户余额逐渐下降，而德国的经常账户自货币联盟开始以来逐渐上升。法国和意大利的流动账户调整仅在欧元危机爆发时才开始，而在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继续上涨，预计将保持高位。

图 2：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百分比）



如何解释三个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德国的劳动力收入份额密切跟踪全球劳动份额的下降。相比之下，法国和意大利自从货币联盟开始以来就摆脱了全球趋势，劳动收入份额甚至有所增加。关于全球经济发展，已有很多不同的经济解释。但很少有论文将这些发展与欧洲货币联盟调整联系起来。证据表明，德国资本相对稀缺是德国劳动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且，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

2、生产力和薪酬

单位劳动成本的计算方法是每位员工的薪酬与产出的比例。为了更好地了解 ULC 的发展情况，我们分两部分：实际生产力和薪酬。我们选取国家 GVA 平减指数作为衡量产量的指标。

图 3 显示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从 1998 年底（货币联盟的开始）到 2015 年的实际生产率和实际的每小时工资。在法国经济衰退期间，薪酬相对于生产力有所增加，但薪酬和生产力的相对发展是平衡的。在意大利和德国，差距不断扩大。在德国，生产力远远高于薪酬，而在意大利，薪酬却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图 4 显示了与图 3 相同的变量，但是使用的是国家价格平减指数。它不包括对竞争力的影响，忽视相对价格的发展。然而，图 4 从一个独特有趣的视角来分析国内发展情况，这对于大部分国家的工资谈判过程很重要。

图 3：使用欧元区 GVA 平减指数的生产力和薪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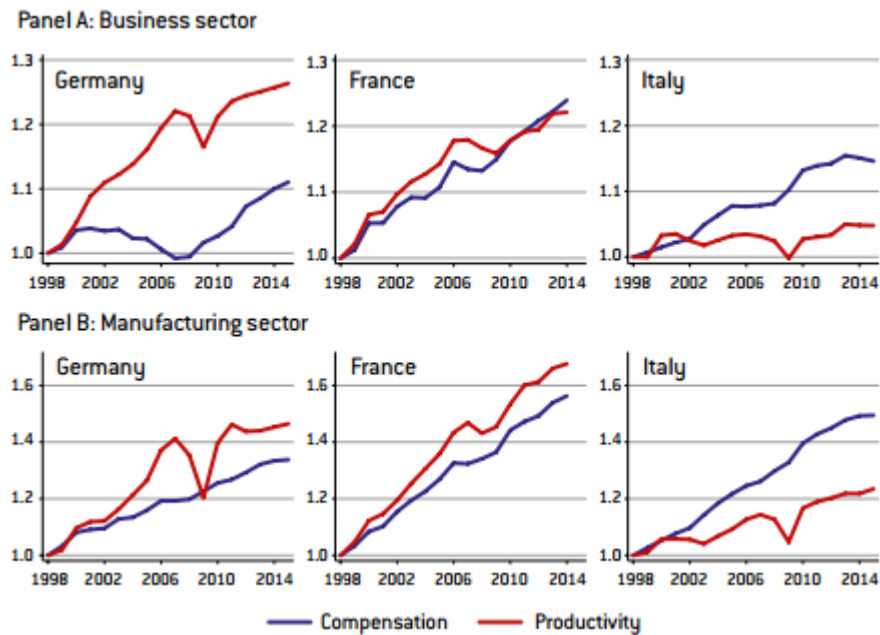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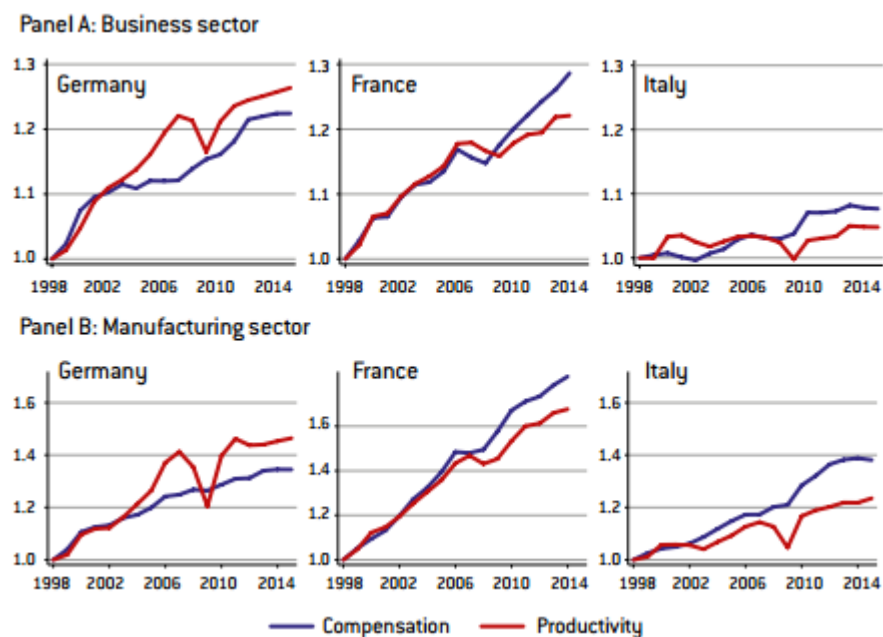


图 4：使用国家 GVA 平减指数的生产率和薪酬



以国家价格计算，法国的劳动报酬自大衰退以来一直领先于生产力。在意大利生产力初步提高之后，自 2002 年以来，薪酬相对上升了一倍。在德国，自 2002 年之后生产力与劳动力报酬差距扩大。使用国家平减指数差距看起来更小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是国内生产商品价格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工资水平可以相对于欧元区邻国大幅提高，导致竞争力下降。

3、欧元区国家的劳动份额

图 5 显示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商业部门劳动份额的发展情况。这与整个经济发展状况非常相似。德国的劳动份额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度反弹回落。法国的劳动份额从 2008 年开始上升，而意大利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持续上涨，尤其是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图 6）。2008 年以前，法国的商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实际上略有下降，这也表明法国的经济产业结构掩盖了部分行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

图 5：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商业份额

Figure 5: Labour shares in Germany, France, and Italy, business se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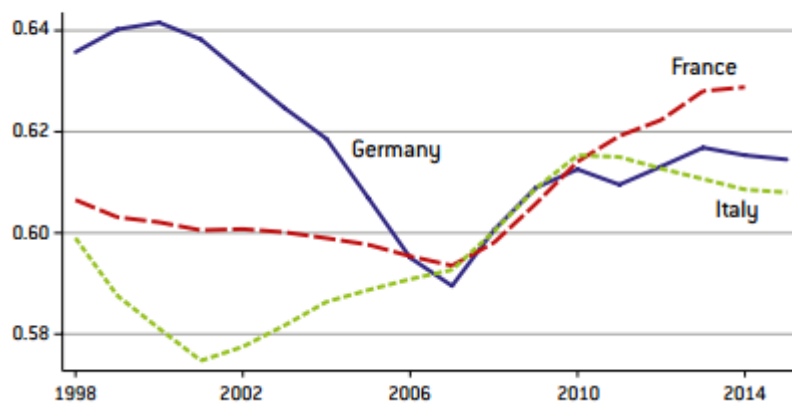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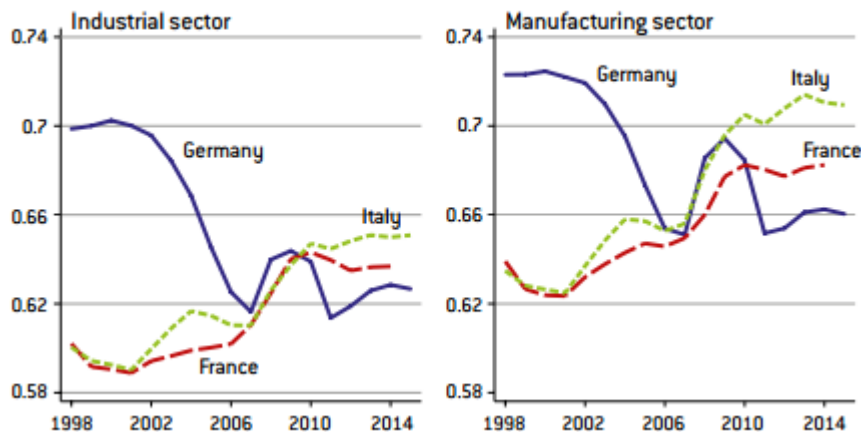


图 6：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份额

Figure 6: Labour shares in Germany, France and Ita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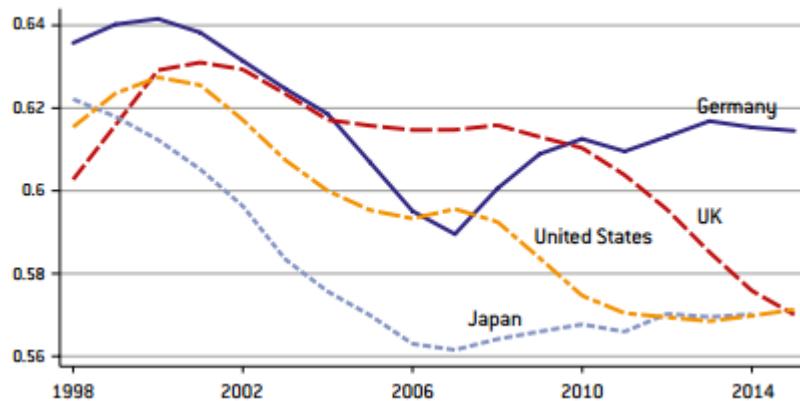
4.全球劳动份额下降

全球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共识（见图 7）。美国自 2000 年以来劳动份额急剧下降。日本自 1980 年以后劳动份额持续下降，但 2006 年以来有所回升。而英国劳动份额下降仅在最近几年才可见。令人瞩目的是，德国的劳动份

额下降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下降幅度相当。尽管劳动份额水平不同，但制造业发展非常相似。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下降尤为戏剧性。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生产力在薪酬增长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只有在英国，这种趋势似乎是不一样的，薪酬的增长越来越快，到最近才下降。

图 7：主要先进国家企业的劳动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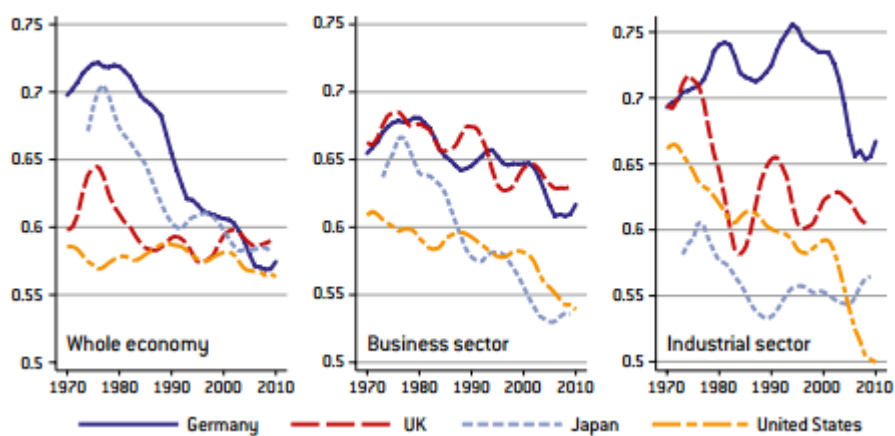
Figure 7: Labour shares in major advanced countries, business sector



从长远来看（见图 8），劳动力份额变动并未出现异常之处。然而，商业部门的劳动份额方面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整体劳动份额可能会隐藏特定部门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整体份额自 2000 年以来下滑，但并不是历史最低点，而在工商业部门却处于低位。特别是在工业部门，劳动份额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与德国类似。

图 8：1970 年以来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劳动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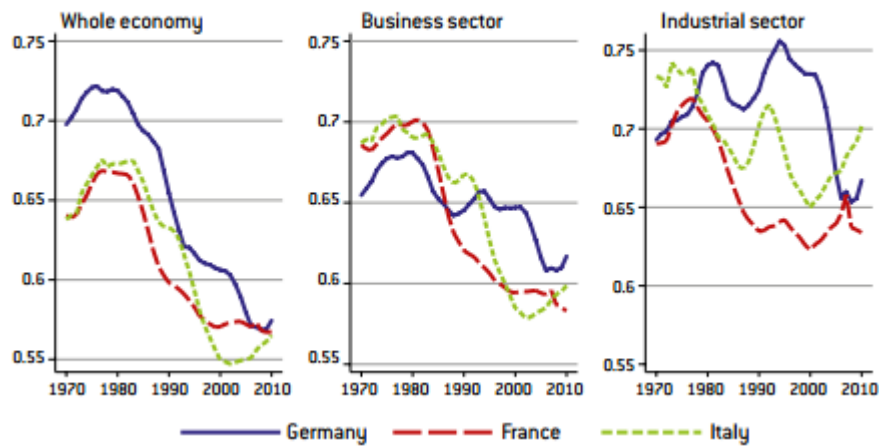
Figure 8: Labour shares since 1970 in Germany, Japan, the UK and the US



意大利和法国的长期趋势是可比的，但货币联盟似乎是造成了结构性突变。图 9 显示，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份额也有所下降，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来，两国的趋势似乎都有所逆转。

图 9：自 1970 年以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份额

Figure 9: Labour shares since 1970 in Germany, France and Italy



5. 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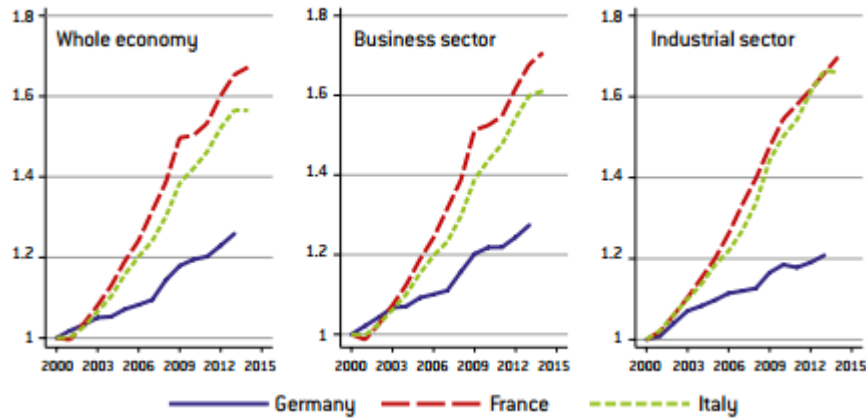
虽然世界各地的劳动力份额下降已成为共识，但对于下降的原因却说法不一。Karabarbounis 和 Neiman (2015) 将全球劳动份额下降与全球投资商品相对价格下降挂钩，并认为这可以解释大约一半的跌幅。他们认为劳动和资本替代弹性大于一，换句话说，劳动和资本是替代品，生产已经转向资本，这是相对较便宜的投入。Piketty 和 Zucmann (2013) 同样认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一。他们发现，资本回报率下降时，资本产出比例大幅度上涨。但是，他们详细讨论时遇到了方法问题。尤其是衡量资本时涵盖了资本收益在内的市场价值，但这应该被排除在外。纠正这种错误会导致替代弹性小于 1。Lawrence (2015) 认为，“Piketty 和 Zucmann 的估计似乎依赖于错误的数据和背包式计算，而不是严格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并且通过调查文献，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一。这些文献的见解可以应用于欧元区数据。如果 Piketty 和 Zucmann 是正确的，我们预计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德国，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比率会有所增加。但在意大利和法国，劳动收入份额有所增加，我们预计资本 劳动比率将会下降或至少相对于德国增长。

图 10 显示了三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率。面板数据与 Piketty 和 Zucmann 的假设相反。法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劳动比例相对于德国显著增加。这与法国和

意大利的劳动力份额不断增长，在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小于 1 的德国劳动力份额下降的情况相一致。

图 10: 资本与劳动比率，使用链指数资本存量，净额

Figure 10: Capital-to-labour ratios, using chained-indexed capital stock, net



Lawrence (2015) 认为，解释美国劳动力份额下降的最佳途径是劳动力增加的技术变革，这意味着技术变革增加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因为它提高了劳动的有效性。例如，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效率。有效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增加时，劳动份额就会下降。劳工由于其更高的效率而能够更有效地增加劳动力。虽然我们的数据分析不是衡量资本和劳动力是否替代或补充的计量经济学测试，但提出了 Piketty 和 Zucmann 关于假设的有效性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了欧元区调整方面的重大政策问题。

6、结论

我们主要发现，德国劳动份额下降与美国和日本的情况类似。但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份额自货币联盟开始以来一直在增加。我们看到劳动份额分歧的背后存在三种互补的力量，并且单位劳动成本是欧元区分歧的核心。

第一个问题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生产资本密度相对于德国呈现强劲增长态势。这个结果与资本和劳动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品相一致。

第二个因素是货币联盟本身。事实上，货币联盟消除了欧元区国家的风险分化，从而大大降低了意大利的资本价格，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国的资本价格。两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逐渐增加，成为净资本进口国。他们的资本股相对于德国而言更加强健，因此工资份额增加。

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影响劳动投入和报酬的制度因素。根据 Visser (2015) 采用的一项措施，德国的工会权力削减，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则保持稳定。另一

个区别是法国工资谈判部分是由最低工资推动的（Avouyi-Dovi, 2011）。在意大利，集中的工资谈判没有考虑到地域差异，尤其是缺乏生产力的地区。

Terzi（2016）认为这是意大利工资与生产力差异的根源。罢工日数是另一个有趣的计量方式：2013年法国每1000名工人罢工的工作天数不到79天，而在德国则不到10天。此外，在德国，社会各界都赞同在二十一世纪进行大幅度工资调整。

此外，二十世纪初期的哈茨劳动力市场改革导致德国劳动力增加，工作压力加大。劳动力增加，一切平等，都会导致劳动力份额下降。因为这样会降低工资，除非相应增加资本的抵消。这种影响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增加的技术变革，而这可能是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另外一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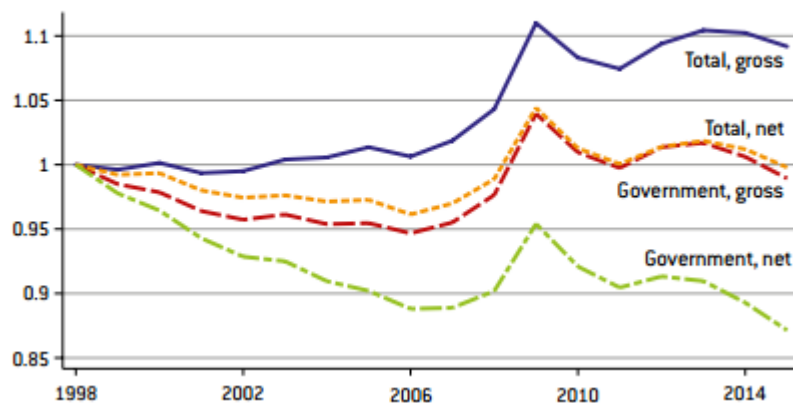
政策影响

我们的结果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需要运用双重策略来调整货币联盟的分歧。首先，为了增加德国的劳动份额，德国需要增加资本。

图11显示，德国公共资本净值一直在下降，净资本存量总额占GDP的比例没有增加。首先，德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增加公共投资的投资策略。在私人投资方面，德国公司减少投资，增加储蓄，使德国成为净资本出口国。因此，中央政策问题之一是增加私人企业投资。

图 11：德国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Figure 11: Capital stock as a share of GDP, Germany



其次，法国和意大利需要通过调整劳动力市场机制来提高劳动力市场供应，由于僵化和内部人保护，打消了部分人口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这一部分是劳动力市场立法的问题，一部分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的问题。

我们的数据表明真正的政策问题。欧元区分歧的核心在于，各国在处理技术变革、全球化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货币联盟对资本配置的影响的方法不尽相同。在货币联盟之外，这些不同的做法将导致增长和生产方面的差异极大，但名义汇率将会纠正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在货币联盟内部，不同的做法导致了大量相对持续的分歧，表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高度结构性失业以及德国的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这一分歧仍然是欧元区决策者的核心挑战。

本文原题为“Regional and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s: the recent European exper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本文作者 Bennet Berger 为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Guntram Wolf 为布鲁塞尔苏黎世学院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Policy Contribution。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全球政策议程

——提高全球经济的普惠性和稳健性

Christine Lagarde /文

导读：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正在加强，但取得更多进展还取决于能否推出政策来支持复苏、提高生产率增速和加强风险抵御能力。在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下，各国已从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多边合作框架中受益良多，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部分群体并没能分享到这些利益：危机后复苏进程过于缓慢，不仅使社会各阶层获得经济收益的空间受限，而且更是暴露出了上述问题。各国应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努力实现更平衡的强劲增长，同时为所有人提供经济机会。为此，各国应展望技术进步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影响，让本国民众具备必备的技能以从中获益，并出台国内政策来更广泛地分享这些成果。基金组织将通过提供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促进平稳调整的贷款安排以及开展能力建设等形式，为成员国提供支持。

当前形势

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加强，但要维持这一势头，还需要支持性的政策

许多发达经济体的近期增长前景都有所改善，一些经济体已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然而，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仍低于潜在水平，其经济活动受到了债务积压、银行体系薄弱、未来增长不确定等问题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虽出现分化，但整体增长正在改善。在国内政策措施、信贷快速增长、近期油价回升等因素的支持下，部分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持续回归正常。不过，全球前景近期改善的预测是以支持增长的政策（如推出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降低系统性经济体的脆弱性等）和全球金融贸易流动未受干扰为基础的。全球前景也面临着政治不确定性和全球融资环境收紧的风险，后者会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

生产率增速还未完全恢复，脆弱性依然较高，这些都继续笼罩着中期的增长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生产率的增速就已下降了。但危机的遗留问题（包括经济前景疲软和不确定，以及私人投资低迷）进一步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经济增速过低且持续时间过长，使得长期人口问题（如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老龄化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应对。外部债务和公共债务高、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信贷和房地产市场过热等问题，导致脆弱性持续存在。这些脆弱性使那些具有较少政策缓冲的国家面临着融资环境收紧的风险。虽然近期大宗商品的价格有所回升，但较低的价格仍对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带来不利影响。

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一些群体未能享受到这些好处

贸易金融一体化和技术进步使全球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使数以亿计的人们摆脱了贫困，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扩大了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渠道，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并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然而，危机后复苏步伐过于缓慢，不仅使社会各阶层获取经济收益的空间受限，也使发达经济体中的部分群体面临长期困难，无法适应技术进步和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在资本与高技能工人回报率上升的同时，中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停滞不前。不平等程度随之加剧，人们也更多地担忧全球一体化对生活其他方面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些都对全球一体化的好处提出了质疑。在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许多职业都面临着自动化和外包的威胁，因此很快也将面临类似的挑战。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人们对现有多边框架提出了质疑

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实现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多边框架在全球带来了巨大的惠益。决策者需要为当前技术进步和全球一体化下的调整提供便利（包括更好地解决部分人群所承担的成本），而同时，历史表明保护主义和内向型政策并非正确的应对之举。虽然全球一体化与技术进步的同时发展使人们难以区分各自的影响，但技术进步似乎才是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便全球一体化趋势逆转，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仍将存在并继续对就业造成影响。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放弃开放而重回保护主义，放弃多边合作而采取单边政策，将使众所周知的全球一体化成果前功尽弃，损害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并可能威胁到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每个人都将沦为输家。

政策挑战和优先工作

维持复苏势头，为全球经济强劲增长打下基础

经济增长需要支持性的政策提供动力，这些政策以“三管齐下”的政策组合为基础，并已在之前的“全球政策议程”中得到清晰阐述。在产出缺口仍然为负或核心通胀率仍然很低的国家，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同时使用宏观审慎政策，以便在风险出现时帮助维护金融稳定。尚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应更多使用财政政策来缩小产出缺口，分担货币政策的负担。在接近潜在产出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应旨在提高潜在产出。推出正确的财政政策组合至关重要，其应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具备更平等的税收收益结构，促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维持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其与结构性改革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提高生产率，解决脆弱性问题，增强全球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

结构性改革对于释放生产率增长和从经济一体化中更多获益至关重要。各国在确定优先任务和改革次序时应考虑各国国情，且结构性改革应以提高对创新和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竞争和市场准入以及提高就业率为目标。各国在一开始可为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支持，而这些改革也能在中期提高增长率，从而改善公共财政，创造财政空间。经济稳健性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这方面的政策优先工作包括：加快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并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以及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对于那些易受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影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应重新建立缓冲，加强政策框架（包括与资本流动有关的宏观审慎措施和政策）。具有灵活汇率的国家应继续用汇率来缓解冲击。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水平上升，应更好地在使用财政支出支持经济发展与重建财政缓冲之间取得平衡。大宗商品出口国应该加快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所进行的调整，实现经济的多元化。

为提高全球经济的普惠性，各国应在国内提供更多机会

有利就业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可持续、普惠增长的先决条件。但在技术变革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要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从经济增长和工作机会中受益，就需要让劳动者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教育和技能培训（包括终身学习）必须成为优先工作。公共部门的支持，加之劳动力市场政策（失业保险、再培训/职业培训、职业流动性及再就业支持等），可以为受工作变动不利影响的人们提供帮助。帮助移民更顺利地融入社会，将使他们有能力为东道国经济做出贡献。最后，各国也应打击偷税漏税，让每个人都依法纳税。

提高经济的可持续性

子孙后代不应为当代人的不慎之举付出代价。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财政框架和完善的债务管理，同时，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还应确保将其降至安全水平。拥有可耗尽资源或面临养老金体系挑战的国家现在就应采取措施，以实现代际公平。各国不应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后果留给后代承担。

在各国间开展多边合作

全球经济在不断变化，各国在适应其需求的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将会使每个国家都受益。各国协调行动促进增长，将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但同时，一国若推出了不可持续的政策，也将通过溢出效应或风险传递使他国很容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存在对外顺差和逆差的国家应在多边框架内开展合作，进一步降低全球的过度失衡。在这种背景下，合作也意味着各国共同努力，确保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和推出旨在保证竞争优势的扭曲性政策。要实现安全的金融一体化，还需要完成全球金融监管议程，必要时还应予以强化，同时维护危机后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在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中，以及在应对冲突、难民问题、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中，不应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最后，在迅速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各成员国应继

续致力于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良好运行，包括维持强大协调、资源充足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基金组织将处于其核心位置，通过贷款帮助各国实现顺利调整。

基金组织将采取什么行动

上述挑战要求基金组织保持灵活，在若干领域提供一体化的政策建议，以满足成员国的需要。基金组织将帮助成员国设计有助于提高增长、扩大经济机会、加强风险抵御能力、促进全球再平衡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基金组织将通过提供贷款并开展能力建设，包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以协助各国实现平稳的调整。基金组织主张多边合作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最有效方式。

为维持复苏的努力提供支持

按照“三管齐下”的方法（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领域采取行动），基金组织将继续根据成员国的具体情况，就维持复苏的政策组合向其提供建议。工作人员将协助各国确定现有财政空间，审议“公共投资管理评估”框架，扩大“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倡议”，并探索相关改革措施以实现有利于增长和公平的财政政策。工作人员将进一步研究财政政策如何能够更好地降低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成本和增进长期收益。

设计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解决脆弱性的政策

基金组织将采用新的工具来确定结构性政策缺口，从而根据成员国具体情况向其提供旨在促进生产率、投资和增长的改革建议。工作人员将继续研究数字经济给衡量 GDP 和生产率带来的挑战。基金组织将进一步加强有关工作，就解决债务积压和减轻金融部门脆弱性提供建议，其中将借鉴家庭债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银行破产制度、技术在金融服务中不断演变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基金组织还将协助增强低收入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政策框架，为经济多元化和调整策略提供支持。为了帮助那些受到撤消代理银行关系影响的国家，基金组织将与其他方面合作，促进国际对话，推动行业解决方案，包括提高代理行管理风险的能力，并帮助各国加强其监管框架，特别是反洗钱/反恐融资方面的监管框架。

促进实施有利于提高全球经济普惠性的政策，途径包括协助各国扩大国内经济机会

为了促进可持续增长，基金组织将力求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宏观经济和分配效应（在不同收入类别、就业类型、经济部门和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工作人员将侧重于具有宏观意义的领域，并与其他组织开展合作，探索能够帮助各国更好地预料到这种长期效应并作出相应调整、从而促进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政策。为此，工作人员将研究财政政策（包括税收累进性、社会安全网的设计和无条件基本收入）如何能够解决不平等问题和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带来

的其他副作用。工作人员还将进一步探索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部门政策对增长、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的影响。基金组织将与其他机构合作，支持有关改革措施，以改善治理和打击腐败（同时评估基金组织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经验），提升商业环境，并促进竞争。在降低失业、解决性别不平等、改善潜在移民在本国的生活条件等方面，这些改革仍是关键所在。

逐步促进实施可持续的政策

工作人员将回顾财政规则和债务管理策略方面的经验，改进基金组织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并探索采用主权国家状态依存型债务工具的空间。在具有宏观重要意义的领域，基金组织将在监督工作中结合移民、性别（包括提高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分析。基金组织将继续就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开展工作。

促进各国采取多边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挑战

基金组织将在第四条磋商和对外部门报告中对全球过度失衡、其根源（包括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扭曲的做法）以及汇率问题进行严格而坦诚的评估。基金组织根据成员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多边一致的政策建议，促进健康的再平衡调整。应基金组织执董会的要求，工作人员将确保有效实施基金关于资本流动的机构观点，更多关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就这些措施是否合理持明确立场，同时探索宏观审慎政策在提高应对大规模、波动不定的资本流动方面发挥的作用。工作人员还将加强国内政策对全球经济溢出影响方面的分析，利用《综合监督决定》更好地将多边监督工具纳入双边监督。基金组织将继续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其他多边机构合作，促进人们更多地了解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带来的好处，并审议降低和缓解调整代价的政策所取得的经验。

基金组织将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国际清算银行）一道，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议程以及改革的一致、及时实施提供支持。工作人员还将协助解决国际税收问题（如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括通过“税收协作平台”开展工作，并协助各辖区加强对付非法资本流动的能力。工作人员将继续处理数据缺口问题，并保证国际统计标准的及时更新。

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口，将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为此，基金组织正在审议主权债务重组的现有债务-债权人参与框架，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有序化解危机。工作人员还在探索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方案，包括与区域融资安排合作，并研究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能否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作。为了进一步增强基金组织的贷款工具，工作人员正在就设立一个新的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以及一个对成员国政策起监测和信号作用的非资金政策工具制定相关建议，并探索加强货币联盟规划设计的方案。最后，基金组织将争取

在 2019 年春季会议之前、不迟于 2019 年年会，完成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和制定新份额公式的工作。

支持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将继续从基金组织获得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其他重要支持。基金组织将与其他机构合作，继续促进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融资议程，途径包括支持低收入国家、脆弱国家和小型国家加强国内财政收入和公共财政管理、深化金融市场以及扩大政策制定者可获得的数据。基金组织还将支持二十国集团旨在促进长期投资的“与非洲紧密结合”倡议。基金组织将协助各国应对冲击，包括向那些承受冲突、难民危机或自然灾害负担的国家提供帮助。在这方面，基金组织将继续支持有关国际倡议，以扩大对受影响国家的优惠融资，在国际伙伴之间实现协调的应对方案。

开展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是基金组织工作的核心支柱之一。基金组织正准备审议其能力建设策略，重点是实现能力建设与监督工作的进一步融合，寻求创新方式提供能力建设，以及与成员国分享能力建设知识，措施包括利用技术、加强沟通、牢固确立基于结果的方法等。为了支持上述工作，基金组织将促进与新的能力建设伙伴的合作，其中包括非传统捐助方（如基金会），并建立更加灵活的融资安排，以此增强战略伙伴关系。

灵活、一体化、以成员国为重心的基金组织

为了更好地帮助各国应对挑战，基金组织将进一步增强其灵活、一体化、以成员国为重心的支持工作。为此，基金组织将在实际增长为零的预算下运作，正如过去六年的做法。基金组织将谨慎管理其预算，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并促进知识共享和提高包容性。基金组织还将制定和实施人力资源战略，确保工作人员具备适当的技能并体现多样性。

本文原题为“The managing director’s global policy agenda: A more inclusive and resilient global economy”。作者 Christine Lagarde 为 IMF 总裁，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麦克马斯特将军需要对美国人讲什么

Gayle Tzemach Lemmon/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继迈克尔·弗林中将辞职和鲍勃·哈沃德上将回绝特朗普的工作邀请后，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将接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2017年2月20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文章《麦克马斯特将军需要对美国人讲什么》，作者讲述了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海外的军事部署，指出“美国是一个战争的国家”。另外，介绍了美国特种行动部队与国家常驻部队的情况，最后期待麦克马斯特的接任会是美国国内外政治向前发展的一个好的开端。文章编译如下：

在迈克尔·弗林中将戏剧性辞职后的几天，国防部长前助手鲍勃·哈沃德也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工作安排。因此，美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常任国家安全顾问。

现在，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将军开始接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工作。

麦克马斯特将军的接任也像美国安全体系面临动荡和美国试图扩大海外战争计划一样，位列头条新闻之中。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想在世界范围实现稳定的愿望与其在国内无法建立稳定格局之间存在严重不匹配的现象。

美国的言行举动并不像是一个战争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公民远离以他们的名义发动的斗争。从结果来看呢？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既不要求，也不珍视国家安全体系的稳定状态，因为他们不关注战争后果的严重性。

但是，这样的解说差距也是危险的。特别是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考虑派遣更多的部队到阿富汗和扩大叙利亚当局时，美国领导人向美国公众和军队解释称：我们是以服务于美国战略目标和解释双方冲突的名义进驻他国的。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国家是百分百应对战争的。然而，已经麻木的美国仍然可以安全逃离不断部署常驻军队的要求。这种差距使得美国将其内部政治混乱视为纯粹的国内事物，而不是世界如何看待、衡量以及判断美国在世界各地战场上是支持或者撤退美军力量的一个关键环节。

换句话说，即使因为距离太遥远，使得美国公民不了解海外战况或者因为不太知情，而无法关心战况。但是美国内部的政治混乱迅速发展超越国界，依然会触动甚至塑造美国对外战争。

我们正处在关键时刻。

现在，五角大楼正按照总统的指示，为叙利亚制定新的部署计划，可能包括将国内部署的常规地面部队加入到已经在那里的特种作战部队中。

而这仅仅是开始。在伊拉克地区，有 4000 多名美军服务、协助伊拉克军队共同对抗 ISIS 组织。在阿富汗地区，约翰·尼科尔森将军在上周的国会上作证说，五角大楼可能会争取更多的美国军队去帮助阿富汗军队反对猖獗的塔利班和咄咄逼人的 ISIS 威胁的战斗。

在也门，非洲萨赫勒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在 911 恐怖事件之后，特别行动作战部队领导夜间作战行动继续进行反恐斗争。上个月，在也门针对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的行动中，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威廉“瑞安”欧文斯的生命被夺走。

美国国内的动荡和外国干涉之间的冲突是很明显的。即使其他美国人不会关注这些，但是那些负责领导和投入战斗的人正在时刻注意着。

广受尊敬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托尼·托马斯将军，在上星期华盛顿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我们的政府依然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之中，我希望他们尽快脱离混乱，因为我们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

托马斯将军在后期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一个指挥官，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尽可能保持稳定”。

这些评论立即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部分原因是特别行动的领导人很少公开谈论国内事务，另外就是美国的稳定状况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所以，一切都在改变。

目前，美国公众对国内领域坚固性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局限于那些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为他们被指控在帮助国外获取情报。还有就是，人们在担心美国的其他人什么时候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国内的混乱会让这种担忧消失？

托马斯将军的评论，使得特别行动部队要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最初人们对 30 年前创立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及其特别行动部队不信任，但是他们在 911 战后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

美军神秘的本性也允许其在没有最大预见性的情况下实现军事目标。在美国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和公众对其最终失望后，奥巴马总统希望避免大量军队处于危险之中，提出了“boots on the ground”计划。

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尽管作战行动正式结束，但是特种作战部署仍继续存在。在 2016 年，美国第一次出现特殊行动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超过常规部队的这一显著事实，而特殊行动人数实际占不到美国军队的 5%。

如果用衡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 VIX 指数去描绘华盛顿本周疯狂起落的动态，那么毫无疑问，目前这一指标将会飞向天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旨在成为世界稳定力量的国家，需要拥有的是稳定的国家安全机构。

我们把麦克马斯特开始接任工作作为一个好的开始，他将帮助我们的公民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战争国家。

本文原题为“[What McMaster needs to say to Americans](#)”。本文作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外交政策研究员 Gayle Tzemach Lemmon。本文刊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日防卫关系

Scott Warren Harold/文 章珏/编译

导读：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对美日同盟进行了一番抨击，但实际上，美日双边关系比特朗普说的要好的多。日本和美国各自都在扩展军事实力，以追求各自在亚太地区的目标。作者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一项急迫的任务就是制定合理的亚太政策。文章编译如下：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关于美日双边防卫关系的论调引起了各界关注、疑惑和批评，特朗普称将改变双边防卫关系的结构和成本，甚至可能鼓励日本发展核力量。而美日同盟被视为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基石。

但是，从某种角度看，美日关系似乎还在正轨上。今年 2 月初，美国防长马蒂斯成功访问日本，重申在未来将继续坚持美日同盟，一周后，日本首相安倍回访美国。最近，美国务卿蒂勒森又称新政府将继续支持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实际上，特朗普似乎将美日同盟关系看的比之前所说的要重。

近几年，为提高其对美关系中的价值，日本采取了许多举措，包括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组自卫队以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而言之，日本已经重新阐释了宪法对于其自卫力量的限制，提高了防卫开支，建立了一支海陆快速反应队，并开始将安全领域扩展到太空。主流专家认为这些动作是一种发展，称不上是革命，日本的安全力量仍受到限制。

日本接下去将采取的行动已经十分明了。关于扩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早已进行。日本很可能购买萨德或者 SM-3。日本还在讨论发展电子战斗机和摧毁对敌导弹基地的力量，此外，日本还在计划购买 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

同时，特朗普政府正申请国防开支提高九个百分点，正考虑壮大美国海军规模，且可能注入更多资金升级核武器，发展最先进的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军事措施是为了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

考虑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于日本的诟病，观察家猜测日本可能会通过额外购买军备和扩展联合防卫工业来安抚新政府。安倍政府已再称其落实搬迁普天间机场坚定的承诺。

关于美日同盟，分析家正在密切关注的另一点是特朗普政府的区域战略是什么，以及美日同盟该如何嵌到此战略中。虽然奥巴马政府的亚洲轴心战略未能实现其全部目标，但它并未死亡，其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是特朗普政府可以继承并继续发展的。轴心代表着美国在该地区的预期视野。虽然该战略可能面临资源缺乏和执行不力的困难，但它还是会在特定方面获得实质性的收益。因为那些地区盟友和伙伴希望建立基于民主、人权、经济发展之上的自由国际秩序，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协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如果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在全球价值、秩序和贸易中贡献美国的领导力，那么美日同盟可能失去其大部分的支柱力量。退缩到军事和经济层面，同盟将继续存在，却会失去维持双方安全和价值的贡献力，无法轻易改变崛起的中国的意志选择，无法有效应对局势迅速变化的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紧张状态。今日美国的亚太政策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挑战就是如何将美国的地区目标和有效的战略手段结合起来。这种战略需要统筹美国的硬软实力，并给予像日本这样的盟友一个清晰的架构以调动起参与度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力量。

本文原题为“U.S.-Japan defense relations under Trump”。本文作者为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以及兰德研究生院教师 Scott W. Harold。本文刊于 2017 年 3 月 3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